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8~2

2018 年 3 月 19 日

中国外交第一馆

熊蕾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驻外外交机构，位于伦敦波特兰大街 49~51 号 (49~51, Portland Place) 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称得上是“中国外交第一馆”。它于 1877 年清朝年间开馆，历经满清、民国，仍然服务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 140 年历史，真正是个“百年老馆”。



这个使馆的由来和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开端一样，都带有屈辱的印记。因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常驻外国的外交机构，原本是被迫设立的。

这个使馆的建立，源于又称“滇案”的“马嘉理事件”（Margary Affair）。

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 1846~1875年）是在英属印度出生的英国人，曾在法国接受教育，1867年2月通过考试被派往英国驻中国使馆做领事工作。

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就图谋中国的西藏、云南。为了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英国于1874年在没有告知中国清政府的情况下，悄悄派了个探险队由缅甸进入中国云南，探测前往云南思茅的通路。英国驻北京的公使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年）派马嘉理前往接应，当然也没跟清政府打招呼。马嘉理接上探险队，和他们于1875年初进入中国云南境内，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了纠纷，马嘉理在乱中被打死。

本来英国不打招呼就来人，其实无理在先，可是这个意外事件却成了英国政府向清政府施压的借口。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又刚被太平天国的内乱折腾了几十年的清政府，已经是“逢洋必败”，对洋人一贯是息事宁人。马嘉理事件也不例外。李鸿章（1823~1901年）以“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的身份与威妥玛签订了完全满足英国要求的《烟台条约》，赔偿20万两白银给英国，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允许英国深入到云南等地，此外还派大臣出使英国道歉——“奉有中国朝廷惋惜滇案玺书，应即由钦派出使大臣克期启程，前往英国”。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派往西方的外交官，是拿着中国朝廷的道歉

书，给人家道歉去的。承担这史无前例的屈辱使命的外交官，是湘军出身、时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1818~1891年）。

郭嵩焘一行 40 多人于 1876 年 12 月 2 日由上海起航，1877 年 1



月 21 日抵达伦敦。2 月 7 日，郭嵩焘觐见维多利亚女王，递交了光绪皇帝致英国女王的“道歉国书”。结果英国方面并不满意。原来人家不仅要求中方道歉，还指望中国派一个常驻外交官去英国。于是中国使团又报国内补办了一个清政府正式任命郭嵩焘为其驻英公使的国书，交给英方。因此，中国第一任常驻西方的外交官，不仅使命屈辱，上任的过程也颇有些糊涂。

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编辑的使馆简史介绍，郭嵩焘一行到伦敦之后，就住在由时任中国海关驻伦敦的对外税务司代表、苏格兰人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1833~1907 年）代为租下的一栋房子里，就是波特兰大街 49 号的使馆现址。

这栋房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外交机构——中国驻英公使馆。它服务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朝代的驻英使馆，见证了中华民族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并随之扬眉吐气。

使馆馆舍是租的，而不是很多人以为的购置的。郭嵩焘一开始租了 50 年。1924 年即将到期时，民国政府驻英大使馆又签下长期租约，后于 1926 年加租毗邻的波特兰大街 51 号，两栋房子的租期均为 999 年，每年租金只有几英镑。如今 92 年过去，租期还有 907 年。因为租约写的明白，这么些年过去，租金从来没有涨。这有可能是鸦片战争之后中英交往中，中国第一次不算吃亏的一笔交易吧。



郭嵩焘当年带来的家具也成了文物。有国内的文物专家来看过这些家具，指出其中好几件堪称国宝。

但是两栋房子是1785年建的，已经二百多年了。先父熊向晖

1962~1967年担任驻英代办（当时中英两国还没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这里工作时，馆舍内部还是木质结构，经历清朝和民国，已很老旧。父亲回忆，他上任后，就向国内打报告申请修缮。批准后，国内拨了款，派了建筑师来伦敦，却被当地文物保护机构制止，说这两栋楼是英国苏格兰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师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 1728~1792年）和他的弟弟詹姆斯·亚当（James Adam, 1732~1794年）所设计的前维多利亚时代建筑，这样的建筑已经不多了，需要保护，翻修也要按他们的标准。之后文革开始，父亲1967年奉调回国参加运动，再没回英国工作。他一直很惦记这事，尤其使馆顶楼还有孙中山当年在伦敦蒙难的地方——他在这里被关押了13天。当时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馆舍的维修要把这个地方保留下来。



熊向晖 1962年国庆在伦敦举行招待会

我 2016 年去英国旅游时，有幸到早已翻修好的使馆参观。听使馆朋友介绍说，过去使馆在二层楼举办活动，还不得不派人在一层用木头之类撑着天花板，以免出事，真是不修不行了。1972 年中英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后，中方再次向英方提出重建馆舍计划，经房东同意后，于 1973 年得到英国政府批准。但英方要求重建的馆舍须保留外立面原貌。几经周折，这处馆舍于 1983



年动工重建，1985 年 9 月竣工。除面对波特兰大街的外立面由原来的两个门改为一个门外，新建筑外立面基本保持原样。内部则不再是木结构，并加建了两层。但因两个房子连通，内部建筑结构改变，孙中山先生蒙难室无法原地保护，只能辟一处与原来的房间大小相同的房间，设置了一个纪念室，其窗户灯具等都和当年的一样，只是把床撤了，放置了民国时期孔祥熙来英国时安置的铜像，还有营救他的英国老师康德黎（Dr. James Contlie, 1851~1926 年）的铜像。

我瞻仰了这间面积虽小但凝结了中国几代外交人心血妥善保护的一处遗址。2016 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得知他当年蒙难的地方被当今中国的外交机构如此郑重地对待，想来孙先生也会很欣慰吧！

附录：熊向晖所写〈周恩来总理关心孙中山伦敦蒙难室〉一文有关片段

1963年秋，我回国休假。周恩来总理找我谈话时，我提到重建馆舍事。

总理说，他已看到代办处给外交部的报告。他说，1921年1月，他去英国，住了一个多月，原想投考爱丁堡大学，因费用太贵，转往法国。他在伦敦时到过波特兰街，感到那里的环境很好。

总理问：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蒙难，是不是被关在这个地方？

我说：他被关在清使馆侧屋的一间阁楼，面积约十平米，光线很暗，只在临街的墙上有个插上铁条的窗口，没有窗框，也没有玻璃。

总理说：没有玻璃，所以孙先生能从窗口丢出一封信，被过路的人捡起，送给康德黎，把他救出来。

我说：过去国民党有人有这种说法。我看过孙先生用英文写的《伦敦被难记》，还看过几本英国人写的关于这件事的详情，和那种说法不同，不是那样简单。

总理很感兴趣，要我讲讲。我曾向国内去英国参观访问的一些同志讲过多次，印象很深。于是我对总理说：

1895年10月，孙先生在广州发动第一次起义失败，避居日本，后去美国。清政府通令各主要驻外使馆密切注意“要犯孙文”的行踪，设法诱捕，送回治罪。1896年9月，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收到驻美使馆公使的电报，说孙文将从纽约坐船去英国。龚照瑗让使馆参赞、英国人马格里花钱委托一家侦探社侦察、跟踪孙文。孙先生于9月30日到达英国，住在一家旅馆里，分别拜访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和孟生。侦探社将这些情况及时报告马格里。10月11

日是星期天，孙先生去教堂做礼拜，路上碰到三个中国人，邀请孙先生喝茶。孙先生重视结交华侨，就跟他们走。这三人是龚照瑗的爪牙，把孙先生骗进清使馆，被关进那间阁楼，龚照瑗派人严加看守。孙先生写信给康德黎，托看守转交，给他好处，看守不敢接受。孙先生把那封信裹着硬币想从窗口丢到街上，被看守发现夺走。龚照瑗密电清政府，说已包租一条船，缺款七千镑，请求赶快汇来，收到后就将孙文秘密押上这条船开往广州。清政府回电同意。使馆职员英国人霍维夫人看到电报，还听说孙文将被处死。她让使馆工人英国人柯尔支开看守告诉孙先生。孙先生将这些情况的要点用英文写在自己的名片上，由柯尔送给康德黎。康德黎找到孟生，他们先雇侦探在使馆外面监视，又分别向伦敦警察厅、英国外交部和《泰晤士报》告发。伦敦警察厅查明清使馆已包租一条准备开往广州的船，马上报告英国外交大臣沙里士堡勋爵，同时派一些警察拿着孙先生的照片在使馆周围巡逻，防止孙先生被押走。英国外交大臣不愿事态扩大，通过私人途径劝说龚照瑗放人，但龚照瑗否认拘押孙文。英国外交部命令马格里书面报告事实真相，并据此函告龚照瑗，指出清使馆擅自逮捕和监禁政治犯，超越了外交特权的范围，如不释放，英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龚照瑗回信说：孙文是大清臣民，自动进入大清使馆，大清使馆是大清国的领土，英国政府无权干涉。

总理说：这封回信倒有点分量，我估计龚照瑗没有这个水平，可能是马格里出的主意。

我说：康德黎的主意更高明，他和孟生促使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在显著地位用〈惊人的重大新闻〉之类的标题公开揭露，说孙逸仙是受英国教育的医生，是虔诚的基督徒，反对清政府的暴政，同情受难的同胞，清使馆竟然在英国领土上将这位年仅 30 岁的爱国者拘捕囚禁，准备送

回北京处死，英国公众绝不容许。这些报道激起公愤，大批英国人包围清使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龚照瑗被迫释放了孙先生。第二天，他收到清政府的七千镑的汇款，但已无济于事。

总理问：孙先生伦敦蒙难一共多少天？他出来以后是不是暂时还留在英国？

我说：孙先生于10月11日被骗到使馆，10月23日被释放，先后共13天。伦敦蒙难是孙先生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这一事件使年方而立的孙先生成为国际名人，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和影响。他继续在英国住了一个时期，许多英国名流学者同他结交，开阔了他的眼界。他还常去大英博物馆读书，认真研究近代政治、经济思想，认识到除了民族民权之外还需要解决民生的问题，初步形成三民主义的思想。

总理说：这段史料应该写出来。如果能找到当时孙先生写给康德黎的名片，那就更有价值。

我说：我在英国人写的书上看过影印件。

总理问：孙先生被关的那间房子现在做什么用？

我说：1933年国民党当局把那间房子专门作为纪念室，挂了一块“孙中山蒙难室”的木匾，现在还在。华侨认为不恭敬，都称为“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室”。1937年孔祥熙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在那里安放了孙先生的半身铜像，现在也在。

总理问：现在还有没有华侨去参观？

我说：经常有华侨，不单是英国华侨，还有外国人——不单是英国人，要求参观。那间房子可能随时倒塌，通过的楼梯弯弯曲曲，很陡很窄，木板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就会出危险。除了个别特殊情况，一般都不让人进去。

总理说：你们给外交部的报告，要求出售波特兰街的房子，并没

有提那里还有孙先生的蒙难室。要是今天不问你，我还不知道。那所房子该不该出售，首先要从政治上考虑。1956年，发表毛主席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篇文章里，主席说，孙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除了反动分子以外，现代中国人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主席列举了孙先生的丰功伟绩，赞扬孙先生既有宏伟的气魄，又很谦虚，不但注意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情况，还注意研究外国情况。主席指出，孙先生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耗费了毕生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刚才你讲，伦敦蒙难是孙先生革命生涯中重要转折点，不言而喻，孙先生蒙难的地方是重要的历史遗迹。连国民党也知道应该设立孙先生蒙难室，许多华侨和外国人要求参观，而你们居然要卖掉，幸亏今天问了你，要不然，同意你们卖掉，怎么对得住我们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怎么向崇敬孙先生的华侨和外国朋友交代？怎么向继承孙先生革命事业的中国人民交代？怎么向历史交代？

我说：总理批评得对，我只从经济问题考虑，没有从政治上考虑。

总理说：应该考虑经济问题，但像这样的事，就不应该单从经济问题考虑。把孙先生蒙难的地方卖掉、毁掉，将来再花多少钱也恢复不了。现在就可以决定，波特兰街的房子不许出售，就在那里按原来的外观和高度重新建造。房子不够用，另外想办法。国家经济虽然有困难，为了纪念孙先生，这笔钱不能省。我派一位有经验的建筑师到伦敦实地考察，回来设计。要在原来的位置，重建孙先生蒙难室，必须保持原样。既然重建，当然要很坚固，但是原样都不变，比如原来插着铁条的窗口，就不要改成玻璃窗。不保持原样，搞得很漂亮，就失去纪念意义，就没有教育作用。将来要把原来的木匾和铜像照样摆进去，房子内原来的陈设，不增加，不减少。保护历史文物就应这样。

总理说，建好后，他想请主席书写“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室”，制成匾额，挂在室外的门额上。请郭老书写主席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全文，嵌进玻璃框，挂在室外的墙上。

总理最后说：这件事，我要告诉孙夫人，这对她是一种安慰。